

先生的引领

■ 凸凹

初闻鲁迅,是源自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那时刚上小学,大喇叭里,有时能听到先生的庄肃言论。给幼弱心灵以最大震撼的,是那么一个短句,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既短且硬且锋利,真如匕首。

小孩子天性好斗,好刀剑,从此就留心收集先生的书。都是些小册子,扉页上印着先生不苟言笑的像,他的唇角很瘦狭,一如刀刃。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白皮书,印制者,有部队、厂矿、学校,甚至还有人民公社和某某大队理论学习组。先生的文字很生冷,符合冷兵器的特质;虽读得吃力,热情却每日俱增——因为本能地感到,对一些看不惯的东西,他的语锋总能“捅”到痛处,很过瘾。

先生的书很能让人长进,小学尚未毕业,我掌握的字词,据级任老师说,就比一般的初中毕业生多了。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有了表达的欲望,居然就写出了在学校甚至在全县都引起“轰动”的诗歌,居然也在山之巅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兴奋之余,对“作家”这两个字生出特别的崇敬,既而变成一种憧憬,喜欢在私下里无节制地涂鸦。

于是,在中学,在高中,我显得比别同学“特别”一些,因为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来做范文,或刻印于蜡版之上,或抄展于墙报一端,有“名人”效应。

为了跳跃“农门”,后来很遗憾地上了农业学院。在就学期间就很不安心于所学的专业,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订阅了《诗刊》《散文》《萌芽》和《青年作家》等文学刊物,老师在讲台上激情洋溢地讲《育种学》,我则且惧且喜地私淑那些潜伏在课桌下的奇章丽句。偶有所犯,被宽恕了;屡屡不改,便被扭拘到学生处,责令反省,写出检查。可笑的是,那份检查竟被我当散文写了,洋洋洒洒万言有余,题目为《我的检查——既当农学家也当文学家》。检查实际上是一篇理想宣言,里面反复提到鲁迅,通篇严谨,凛然不可侵犯。学生处的领导也是钟情鲁迅的,审检完毕,久久无言,最后说:“你喜欢文学,我不反对,但前提是功课要及格,能保证毕业。只有这样,你才能被顺利地分配工作。”他的话我是懂的,因为鲁迅早把话摆在那里——人生的正途,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是说,生存是第一要务,人不能“栽”在自己的理想上。我很感激他,保证道:“您放心好了。”

就这样,一边农学着,一边文学着,青春的岁月被塞得很满,以至于在不知

不觉中就到了毕业的时光。同学们都预先设计了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大都去了各级科研机构,稍差一些的,也留校教学。来自乡野,却拒绝乡野,是普遍的心理。因为未曾设计,便听天由命地被分回原籍的一个叫良乡的小镇。提起良乡镇,人们漠然,但说到“良乡板栗”,大多数人的眼睛就亮了。这是个著名的品牌,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都是很推崇的,因而国内的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天津和宁波等,在板栗出口时,都要打上“良乡板栗”的商标。所以,虽然被“发落”到最基层,但因为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心态也是平和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学的濡染使我有了一种不被现实功利所左右的心胸。那时我想,无论如何,只要那个地方还有一月小小的新华书店,一家邮局,可以买书,可以订阅报刊,可以投递稿件,就是一块乐土了。而镇机关的对面,只隔一条马路的距离,正是一月书店和一家邮政所,真是天赐大福!

书店的店面很小,架上居然赫然地摆着一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心跳加剧,感到那是先生对我的邀约。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982年第2次印刷本,简体,页白,疏朗,大方,价五十二元整。怕被别人“请”走,便要求店员给一个保证。店员说,这套书在架上已经摆放了一年了,还未遇见买主,你就放心吧。内心仍是忐忑,便久久地在柜台前逡巡。突然发现那店员正坐下来卷烟,便凑上前去,从他的卷烟纸上撕下来一张,“逼”他签了一张“订单”。

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居然只有三十二元,离请先生之资尚差不小的距离,不禁喏然,整日絮叨,仓皇不安。机关里有一李姓女子,闻之嫣然,慨然送上银两,遂成就愿望。事后得知,她乃一单身女子,对我别有设计。所以,命中注定,我请定了先生,她也把我套牢了。年后与她成婚,再年后与她产下一子。先生有奇伟功力,不仅能开启少年“天眼”,也能牵掣青年姻缘,遂作命运之叹。十六卷大著放于案头,未曾开卷,就觉天地阔大,文心深厚,须静敛心性方可破译一二。便不顾市井颜色正好,潜心阅读。以前接触的是小册子,且大多是文选,读时便率性随意,毫无顾忌;眼前却是全编,再挑拣跳跃地看下去,凭空就觉得有衰淡的味道。便从头读起,一字一行,都不敢漏过。先生的文字,特别是早期的篇章,幽深玄奥,有阅读困难,但还是硬着头皮“啃”下去了。系统地读完,用了一年的时光,具体时间是在1983年至1984年之间。

当然,真正读懂是不可能的,离通透更是差之千里。但是,系统地“走”上一遭之后,自身的感觉发生了重大变化:觉得自己有文化了,有重量了。从那时起,看人看事,不再迷信世俗的尺度,而是先发出“天问”,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小小年纪,性情谦和,但喜抒发一己之见。给领导和同志一个特殊的印象:此人异秉,只是在这个小地方“暂栖身”而已。

因此,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叫“孤独”的东西,心底也常常莫名其妙地就忧郁起来。那个时候,正是文艺的复兴时期,人们对作家和文学有普遍敬意,当下的作品屡屡走红,屡屡被身边人推崇。我自然也是其中一员。但是,一经系统地“鉴赏”过先生,居然就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觉得当下的作品,成色轻浅,是不足以被倚重的。内心里还发出这样的声音:此等作品,我也是能写得出的;而且不写则已,一写,则……

为了做一验证,便在一个酒醉之夕,在网页碎散白纸上信马由缰地写了一通,也不曾抄检,转身就扔进邮筒。那时邮寄稿件,是不须贴邮票的,只需注明“稿件”二字就通行无阻。不足旬月,居然被报纸登出来,位居头条,且被标上“小说”两个堂皇的字眼。又不足旬月,居然看到一篇赞美的评论,文章的作者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个著名人物。意外的收获,激发了满腔的狂妄,便又信手拽过两页碎散白纸涂抹一番。不期又登了出来,便生出所谓作家不过如此的感觉。

不久竟被邀参加了全市的文学创作会议,可谓一路顺风。在那个会上,我见到了责任编辑。他露出极为诧异的表情,说:“怎么,你竟然是个白面少年?”问其缘故,他说,从纸面上读到那么老到的文字,以为一定会是个长者。

听到如此评价,内心受用,话语不禁飘浮起来。责任编辑有些不悦,严肃地说,既然年纪尚小,写作时要体现“认真”二字,要把文章恭恭敬敬地写在稿纸上,不然换了别的编辑,会被当作废纸扔进字纸篓里的。他还告诉我,我涂抹在散碎白纸上的歪斜文字,是他整齐地抄写在稿纸上之后,才拿到排版车间的。

我的随意,他的认真,令我面红耳热,一下子顿悟出一个道理:文学是不可玩弄的。

事后想来,我的所谓老到,并非一己的质素,而是鲁迅先生的提掇——他思想的深刻,文字的老到,影响了我——我写作的起点,是先生的肩膀。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就更离不开先生了。我买齐了先生著作的单行本,作

为枕边读物;而把皇皇的全集整齐地放在书架之上,作为镇宅之宝。心中供奉着,手边摩挲着,让他的脉搏、体温和气息融入我的生命。

一路写来,未见过面的读者,都以为我是南方人,因为我的语言风格有江浙风韵;认识我的人,也十分惊奇,你一个粗犷的京西人,怎么笔下的文字却是那么沉郁精致?

既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我的文学,坦白地说,就是沿着鲁迅先生语言的轨迹渐行渐远的。我酷爱他的语言,但又摆脱不了自己的出身,便在京西土语的底色上揉进了先生的“字话”,于是,就有了一种既土又雅、既刚且柔的风格。

如此说来,我是先生栽培出来的一棵植株。

继而言之,我早期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主要写的是京西乡土。乡土是风情万种的温柔之地,很容易让人沉溺其中。然而,用毛志成先生的话说,凸凹虽然写的是乡土文字,却没有“匍匐于乡土,醉倒于乡俗”,而是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挖掘出了乡风民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蕴,泥土的文字之中有很高的“文化含量”。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文格,还是来自先生的遗传基因。

先生的乡土文字,特别是他的《朝花夕拾》,虽娓娓道来,却是对乡土的人性反思和人文批判——他是在给中国的“国民性”作历史注脚,给民族文化惕厉出被善意遗忘的那些真实、深刻而又本质的“遗传细胞”。是别一种杂文!所以,先生不仅赐予了我“物质层面”的语言,也赐给了“精神层面”的思维。

对先生就这样默默地追随着,我的文字之道,便有了远行的底气。虽不温不火,却有着实实实在在的收获。写着,孤独着,也幸福着。

就这样,我写出了近千万字的作品,也出版了六十余部集子。而且还一直在不停地写。这是鲁迅生死观的支撑——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工作着才是幸福的;倘不工作,那就是“白活”,而“白活”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但身边的友人也时常给我送上“悲悯”,说,你的文字,虽然有那么大的体量,却没有“大”的影响,价值还常被低估,究其原因,是你不会“经营”。如果你用心获个鲁迅文学奖,就不一样了,你所有的文字,会立刻被带“活”,就脱颖而出,成为不可小觑的大作家了。

我笑着回答道,你说得有道理,但伟大的鲁迅得过鲁迅文学奖吗?

友人笑着摇摇头,说,真拿你没办法。

浙青同心 书香海西

■ 陆彩荣

书香中国,龙马精神。看书学习,小则利民、利个人,大则利国、利世界。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识字断事的人,都会看书学习。看书学习,是人进阶、生长、成熟的基础,是民族、国家、社会成长、壮大、前行的力量源泉。

书,从远古的崖窟壁画、河图洛书、甲骨文、经卷帛书乃至钟鼎刻符、竹筒记事等等,一路进化而来,是知识的累积、文明的载体,更是文脉的赓续。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五千年的文化史,何尝不是图书进化史?何尝不是人与书共生共长、共建共荣的成长史?

人类都重视看书读书,许多国家都在提倡全民阅读。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为全球共同营造读书的气氛。

其实,读不读书,读多少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内因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每个读书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见。社会只要能营造好适当的环境、气氛,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建好图书馆、图书角、图书屋、图书中心之类,筑巢引凤即好。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强调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阅读为本,强调“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朱舜水在《答野节问》中说:“三日不读,口生荆棘;三日不弹,手生荆棘。”

当前,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自《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民阅读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这一《条例》明确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活动,支持全民阅读设施建设。

这一点,浙江援青者们是深得三昧的。在持续15年的浙江对口支援青海海西州工作中,在百业待兴的万千头绪里,浙江援青指挥部不忘提倡阅读,不忘营造文化氛围。他们在遥远的冷湖畔茫崖地区捐建了一座公益图书馆,首期总值百万元的图书已经到位。在山高水长、天高地远的民族地区,种下了一棵知识之树、生命之树。相信那些饱含热情、亲情与温情的图书,将不断滋养当地多民族儿女的性情,打开他们通往知识世界的智慧窗口,滋养海西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幸福巨树、生命之树。

我始终对对口帮扶工作心生感慨。那么多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青年优秀儿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辞家离乡,远赴西北东北等经济社会欠发展的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扶智扶志,加快发展,一年接一年,一茬接一茬。与脱贫攻坚一样,他们创造着中国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国特色的结晶,更是中国智慧、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的生动体现。

记得在西藏林芝鲁朗小镇,就建有一座援藏纪念馆。馆内满墙名单赫赫,满室星光灿烂。尤其是那些不幸献身的英烈们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历史将永远铭记对口支援工作的丰功伟绩!致敬所有参与过和将要参与此项工作的援建者们!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创新性地设立了全民阅读活动周,为在全社会提倡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提供了机制性、制度性的保障。这必将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共同建设书香中国的热情与定力,为中国梦注入更多的文化力量。

人勤春来早。早春二月,浙江援青指挥部联合青海省专家人才联合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等共同举办“浙青同心·书香海西”全民阅读活动,以书为媒,为高原各族群众带来精神滋养、点亮心灵之灯。

在西宁、在海西州,从文化讲座到捐书活动,从传统国学讲到现代文化,从治国理政谈到文化思想,学以致用、内生内容、思想丰富,各族民众争相参与,民族团结之花在书香浸润中更加绚丽绽放。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活动缘起说得好:当钱塘江畔的书香遇见柴达木的风雪,当江南温情融入高原星空,这场跨越千里的书香之约,将为海西各族群众带来更多精神的滋养、奋进的力量。

“浙青同心·书香海西”全民阅读活动充分证明,全民阅读不仅是文化惠民工程,更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它将东部地区的文化资源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促进了文化润心、书香铸魂。

俗话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谁能想到,今年我所参与的首场全民阅读活动是从早春时节,从遥远的青海,从“浙青同心·书香海西”开始的呢?

面朝书海,春暖花开。当书香与花香交织交融,飘荡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看到的将不仅是一场场阅读活动的蓬勃开展,更会是一个民族精神底色的不断亮丽、文化自信的不断彰显。

当书香社区、书香乡村、书香机关、书香企业、书香校园……在神州大地争相涌现,当善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日益成为我们全社会的生活方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定会春潮澎湃、花好月圆!这新时代场会,怎不令人陶醉?

温情的回望

■ 孙侃

周末翻阅散文集《远望·回望》,被那股裹挟着岁月温度的文字力量深深触动。朱真伟先生这部沉淀二十载的作品,并非简单的怀旧絮语,而是以文学为镜,将江南乡村的烟火人间、消逝的传统手艺与转型时代的集体记忆熔于一炉,在“远望”与“回望”的双重凝视中,完成了一次对旧日时光的美学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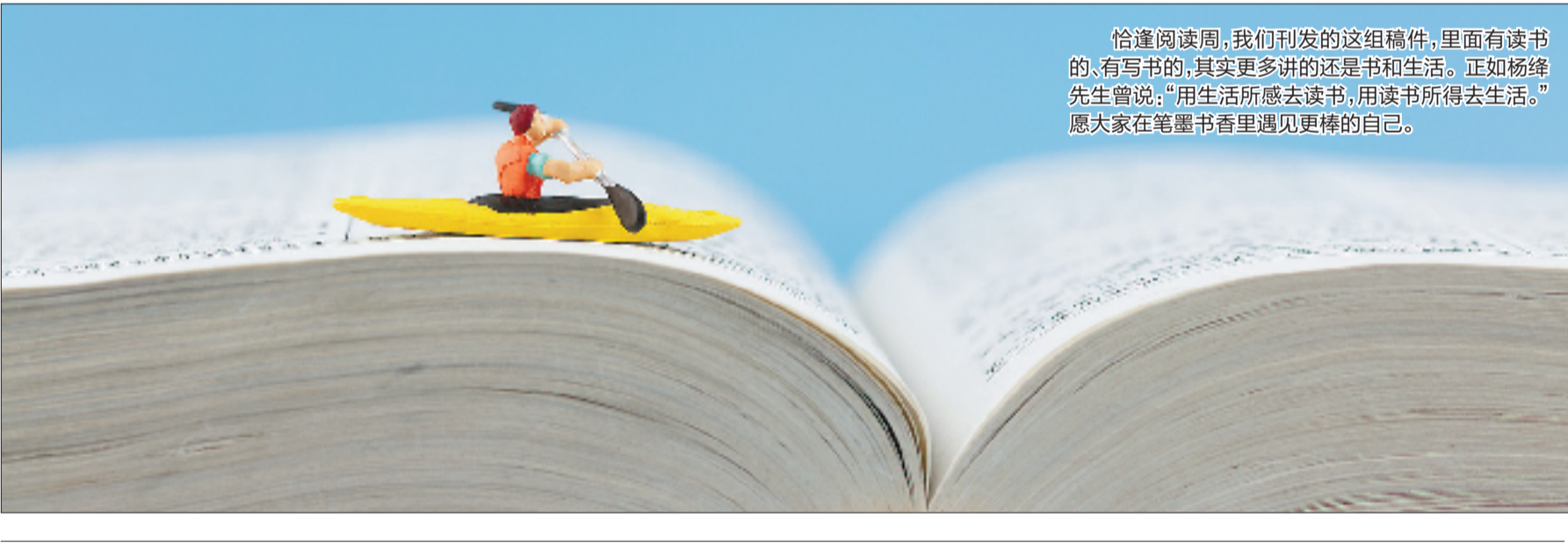
此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对“匠人精神”的深度诠释、对民俗风情的细腻描摹。《掰开细丝万千条》中,燕姑婆做炒面时“看天行事”的从容,对水温、盐量、发酵时间的精准把控,不仅展现了传统手艺的精妙,更诠释了“艺”不仅是技术,更是顺天应变的生活智慧;《那年端午那时粽》里,母亲积攒箬叶、手工包粽的细节,让物资匮乏年代的节日仪式感跃然纸上,那弥漫的粽香既是味觉记忆,更是维系家情感的文化纽带;而《又见油纸伞》则将这一传统器物的实用价值、工艺之美与文化寓意层层铺展,从鲁班妻子云氏的传说层到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意象,油纸伞成为承载乡愁与诗意的文化符号。作者笔下的这些文字,平淡质朴,没有刻意煽情,恰恰是在这样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中,让读者不知不觉感受到了传统生活中存在的美学质感。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部散文集的创作,其价值远超表面化叙事怀旧本身,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哲学打捞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朱真伟先生在后记中坦言,写作源于儿子“能否做叔公、舅公”的

天真提问,这一提问触及了独生子女时代的亲情伦理变迁与城市化进程中一些传统的有形无形的消逝。书中那些逐渐消失的补碗手艺、油纸伞制作、节气农耕等元素,不仅是个人记忆的时代载体,更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家与民生巨变的缩影。的确,这样的怀旧并非简单的历史回归和呈现,而是“对现代性缺失的价值补偿与美学重构”的积极探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际温情联结、劳动本真意义的深切呼唤。

“田园将芜胡不归”,难能可贵的是,沉湎怀旧之时作者却并未将乡村理想化。他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乡村的局限性,其怀旧是“借助过去,以想象另一种未来的可能”。这种理性思辨让作品避免了感伤主义的泛滥,多了一份文明转型的诗意明亮的思考。无论是《瓦书》中以诗性语言书写的烧瓦匠小姑婆,还是《闷热天里做先生》中不求回报的民间医者“老爹”,都在展现情感与人性之美的同时,暗示着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弥足珍贵。

掩卷之余,尤为感慨。作为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朱真伟先生能在繁忙工作之余,仍有坚守文学初心的执着。这部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年,从儿子小学一年级写到博士毕业,从忙碌工作的间隙,他竟然不温不火地煮海为盐,直到终于成书,这份“帚自珍”般的坚持,恰如他笔下匠人的“斤斤计较”,只为呈现最好的文字成果。是啊,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描写,那些饱含温情的人物性格刻画,其背后展示的是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对文字的敬畏之心。



恰逢阅读周,我们刊发的这组稿件,里面有读书的、有写书的,其实更多讲的还是书和生活。正如杨绛先生曾说:“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愿大家在笔墨书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耕作另一种麦穗

■ 卢文丽

去年,我出了两部诗集,一部旧体诗集,一部现代诗集。回望四十余年写作历程,诗歌始终伴我同行。

我的起点并不顺利。因数学不好,两次高考失利,招工进了邮局,被分配到一所大学的邮政所。白天办汇款、卖邮票,晚上读电大。工作间隙,我就伏在柜台上写诗,后来作品陆续发表,获了一些奖项,被录取到复旦作家班脱产进修。结业后考入《杭州日报》,成为副刊部文化记者。大前年,还收获一枚“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纪念章。回望来路,从高考落榜青年,到新闻战线人员,再到笔耕不辍的作家,当初,是诗歌让我完成了“逆袭”。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年来,成长记忆、家族来处、日常的山水风物,反复进入我的写作。西湖是我书写最多的地方,曾出版西湖主题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被评为杭州城市礼品。此后又历时近十年,完成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书写家族史和女性的命运。

写作《外婆史诗》期间,生活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故。其后多年,我一边工作,一边抚养一对年幼双胞胎,在职业女性、母亲和写作者之间不停切换。做

饭、洗衣、开家长会、赶版面、给躁个儿的儿子们送夜宵,生活被切分得细碎而紧张。出身军人家庭,又是家中长女,我并不惧怕困难,生活的常态本就曲折,面对命运,能做的唯有接受,然后继续向前。

陪伴孩子们走过小升初、中考等阶段,直到他们相继长大、出国求学,我迎来了空巢,不久又逢疫情,生活节奏骤然放缓,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完成了《幽暗时刻》《暮春之初》《廿四回头狐雁》等短篇小说,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与旧体诗不期而遇,开启了一段新的写作旅程。

我与古典文学的缘分由来已久。童年时,父亲书架上那本纸页泛黄的线装《唐诗三百首》,是最早的文学记忆,完成电大毕业论文《论老庄哲学对陶渊明思想的影响》时,我刚二十岁。自小生活在西湖边,我家周围曾留下诸多女性书写者的历史印记:李清照的清波门,林徽因的蔡官巷,陈端生柳浪闻莺对面的旧居。行走其间,我常想,自己对诗词的一往情深,或许也与这片水土文脉相关吧。

我自2019年起开始系统创作旧体诗词,将杭州山水、西湖四时、日常工作见闻和感受,纳入与古典的格律之中。我写西湖的春夏秋冬,也写父母菜地里的寻常日子。写带队赴下姜村采访,也反映“西湖柳树被拔”等城市公共事件。

因长期写作新诗,我在创作旧体诗时,不太拘泥成规,会保持表达的开放,我觉得城市的孤独、网络世界的喧哗乃至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进入格律,成为当代经验的一部分。

在实践中慢慢发现,新诗与旧体诗,并非对立,反而可以相互滋养,格律看似限制,实则帮助语言建立边界,使表达更凝练、含蓄。在信息密集、情绪过载的当下,旧体诗所提供的,或许正是一种“节制的自由”。2025年7月,旧体诗集《只衔花气与多情》出版,收录了我六年来创作的246首诗词作品。对我而言,写旧体诗是一种自然的生发,是生活的调适与点化,也让我以更从容的姿态面对喧嚣和风雨。

南方,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季节在这里有着清晰而缓慢的刻度:雨水、节气、草木的荣枯,与人的生活彼此呼应。历史的回声、民间的日常、山水与劳作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渗入我的性情,也影响着我对语言的理解,让我在写作时学会放慢、克制,学会谦卑与耐心。江南于我,不仅仅是居住和工作之所,更是一处安放语言和心灵的精神家园。许多诗意并非来自宏大主题,更来自生长于日常的吉光片羽。2025年10月,我的现代诗集《劳作与花开》出版。全书以“立春”“谷雨”“芒种”“白露”“大雪”分辑,在

节气的推移中展开书写。爱与美、劳作与日常、内在精神与外部生活,在时间的循环里彼此照见。书中既有短诗,也有组诗与叙事长诗;我写劳动,写技艺,也从女性的视角书写江南,向古典精神致敬。我试图通过诗歌连接传统和当下,让个人经验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让劳动的价值被重新感知和照见。

捷克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常将体力劳动与写作并置思考。在《写诗的手》中,他写道:“这双手曾握过犁,也曾捧起面包和泥土。如今,它只握着笔,在纸上耕作另一种麦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诗歌被赋予了无法替代的重量。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诗歌之所以仍具顽强而独特的生命力,正因它深深扎根于写作者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之中。

童年时,外婆常对我说:“只要有一双手,苦日子也会开花。”她还说:“人的一生,像手上的茧子,磨厚了,才顶用;也像腌咸菜,石头压得越重,滋味越香。”外婆不识字,她的话很朴素,却让我铭记至今,教会我理解命运与时间,更让我坚信人生的磨砺,终将转化为内在的滋养。

诗,不仅是写出来的,更是活出来的。

愿我们都能在永恒的劳作中,听见花开的声音。